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Pai-I

江应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主编 尹绍亭 夏代忠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

江应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 / 江应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ISBN 978-7-222-05501-8

I. 摆… II. 江… III. ①傣族-民族地区-地区经济-研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②傣族-民族文化-研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IV. F127.742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489 号

出品人: 汤汉清

策 划: 尹 杰

责任编辑: 尹 杰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余 祁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
作 者	江应樑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501-8
定 价	38.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序

尹绍亭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义概念之分; 民族学 (ethnology) 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大致而言, 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 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 其状况类似日本, 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名称, 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即沿袭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具有文化和学习文化的能力, 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 使得文化的学习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 正因为如此, 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 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 原因即在于此。然而, 当前该学科所显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 却另有缘由。

在当代社会, 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 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 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 根源却非工业信息和物质技术, 而在于文化。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而当事国却不甘示弱, 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无可非议; 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 发展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 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 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存成为热门话题, 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 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罪魁祸首”。此外, 君不见中东战火无

穷尽，生灵涂炭灾难深！有人说那是石油的战争，而“文明冲突”的解释，却令人耳目一新。国际大事如此，国内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亦无一不与文化相关联。面对当代社会的困惑，文化的审视和诠释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魅力。那么作为致力于文化法则研究的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的人类学因此顺势而兴，渐露显学之态，也便不足为奇了。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可用四句话加以形象的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其时军阀割据，动荡不安；此后抗战八年内战四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辛勤耕耘，筚路蓝缕；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竟被看做资产阶级的学科而取消；80年代改革开放，清除了“极左”思潮，人类学民族学才得以恢复和繁荣。沧桑百年，斗转星移，现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虽然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面对当前国内外悄然兴起的文化自觉和无所不在的文化诉求，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无疑承受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以提高国民的教养和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均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课题如山还得从基础做起。就学术事业而言，优秀成果的产出和积累始终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多年来笔者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负责主编过几套丛书，为促进学术的交流和发 展添砖加瓦。此次云南人民出版社秉承奉献社会、光大学术的一贯宗旨，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决定出版“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我们能参与其事，感到十分荣幸。学术贵在创新，一套好的丛书也必须有独到的创意和追求。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第一，尽可能汇集老中青几代学人的作品。如前所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纵观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丛书，还没有系统地反映上述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成果集成，这是一个缺憾。当然，现在要弥补这个缺憾是比较困难的。众所周知，第一代人

类学民族学家大多已经辞世，除了他们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之外，欲搜寻其传世很少或者未曾面世的遗作，困难不小。所幸的是，本丛书觅求到了那一时代几位著名学者的大作：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梁先生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三位先生的大作虽然不可能充分反映同时代学者的业绩，然而毕竟使丛书增添了我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光辉，而且其时学者们的学风、学品、学问已昭显于其中。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过多已迈入古稀之年。他们长年的耕耘积累，大多整理出版了；但身手尚健，老骥伏枥，志趣不减，把握潮流立足前沿笔耕不辍者，已屈指可数。令人欣喜的是，恰恰是这一代学人中的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为我们奉献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杜玉亭先生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女士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数量也仅为三册，虽然远远不能反映同代学人的伟业，然而作为承前启后的桥梁，那一代学者的理论功底和田野调查的水平也足可窥见一斑。有了上述两代学者的作品的支撑，加上选择相对容易的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系列，这可以说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学术取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草创发展阶段，老一辈学者们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优选国外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应用，较快地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可参照选择的理论方法还不多，仅为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等。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受“左”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被误解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然而其时学术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此领域和相关专业的许多学者实际上仍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事着民族调查与研究，但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基本断绝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众多理论方法迅速被引进，新的理论流派令人目不暇给，犹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错综复杂，蔚为壮观。本丛书的选题，注意到了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取向多样性的特征，除了有历史、考古、生态、经济、饮食、认知、象征、宗教、婚姻家庭、政治、

艺术以及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之外，还特别组织全国的学者编写了包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现代民族学》和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部综合性著作的写作，也力求有所突破。国内以往的概论和通论，皆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完全是外向的视野。而这两部著作则不落窠臼，在进行国外理论流派梳理的同时，亦重视本土学术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关照了当代多样性的理论取向，使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互融，并重视本土研究成果，形成了本丛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

第三，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和宏观理论研究兼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范围十分宽广，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和写作的样式自然也不拘一格。然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必有其专门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其基本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途径便是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迄今为止，该学科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即多为此类作品。时下标榜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拼盘”“杂烩”式的作品不少，看似时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伪劣，说穿了那不过是逃避田野的障眼之法。本丛书对此类著作自然不感兴趣，所选专著绝大部分即为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之作。而田野研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定点的个案研究，另一类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之中，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杜玉亭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杨福泉的《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郑晓云的《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等，便是个案研究的规范而扎实的作品。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本丛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尹绍亭的《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郭家骧的《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等，即属此类。我们说人类学民族学是实证的学科，所谓“实证”，那就是用从田野获取的资料和研究来验证理论。以微观洞察宏观，以特殊阐释普遍；反之，从宏观探究微观，从普遍解读特殊。该学科所做的学问，就是这样的田野和理论的互动循环。由此可知，除了田野实证研究之外，宏观的理论研究也不可或缺。为此，本丛书特别选编了《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宏观性的理论

著作。两书的作者们均以开阔的视野，结合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整理阐释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流派。基本上满足了编者欲统筹田野和理论两类著作从而扩大读者面向的策划编辑思路。

第四，写作队伍来自全国，阵容可观。本丛书既然称之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汇聚全国的学术精英加盟执笔，就应该尽可能地体现全国同行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短时期内欲在全国全面组织书稿殊不容易；且由于丛书规模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第一批专著只能以云南学者的作品为主。而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扩大其代表性，本丛书特别邀约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共同撰写《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书稿，此举可谓学坛一大盛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是缺少深度的交流和正常的批评。交流流于形式，批评误作攻击，均非正常的现象。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或文人相轻、争名夺利的陋习，无疑是阻碍深入交流和正常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丛书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除了提升作品质量和扩大丛书代表性的考虑之外，亦有贬抑学界不良风气，提倡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实事求是的做人和治学的目的。

以上说了编者在策划组织丛书时的几个方面的追求，它们当是此套丛书的新颖和特色之所在。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质量。关于这一点，可留待读者慢慢品评赏析。如果能够多一些反响和批评，那是编者和作者求之不得的。作为编者，还希望能将此套丛书继续编辑下去，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不足，而且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例如选编中国学者在国外从事研究的著作等。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们，几乎全部选择国内做田野而走不出国门，对此国外学者早有批评。缺乏国外田野的视野，实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差距之所在。当然，这毕竟不是靠学者单纯的努力可以解决的，它还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关系密切。不过近年来国内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捷足先登，选派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到周边有关国家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相信再经过5到10年的时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便能突破田野的“本土化”而进入国际化的时代。

2008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能够承

办这样的盛会，是中国和云南学术界的光荣。那么，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为此次大会献上什么礼物呢？对于学术会议而言，最好的礼物自然是学术成果。古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学者之乐自然莫过于以文会友、交流切磋。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本丛书第一批印制精美的著作于大会之前问世，将为会议增添光彩，并将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最后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晓燕社长，多年来，她始终热忱支持和鼓励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令人感动和敬佩；感谢与我一同主编这套丛书的夏代忠先生，在我出国期间，他承担了不少繁杂的工作；感谢负责策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尹杰学人、责任编辑李锦雯女士以及参加丛书写作的作者。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批高水平的著作，而且印刷装帧如此到位，实非易事。本丛书的问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的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研究成果，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2007年深冬识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序

去年夏间在广州写完了《摆夷的生活文化》一书，适陈序经先生自天津南来，在百忙中为我校阅了原稿一遍，并鼓励我再立一个大计划，写一部西南民族通论这样的书。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拟以三年时间完成之。秋初，序经先生再度南来，接长岭南大学，于校中成立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约集同道，拟从事一点有计划的研究工作，并嘱我将《摆夷的生活文化》一书交由所中出版，但那部稿子已与上海中华书局签订了出版合同，我便答应另写一部来应命。接着我应云南大学社会系之聘，由粤转来昆明，虽然功课不算多，但俗务物纷杂，前后花去三个月的时间，始把这一册仅七万字的稿子写成，这其中，要不是老友岑家梧兄不断的督促与鼓励，恐还不能如期交卷。

全书仍然是根据我个人历次在边区考察所得的实际资料而写成。我个人所到过的摆夷区域，西部为腾冲龙陵沿边的芒市、遮放、猛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潞江诸土司地，考察的时期是1937年和1938年冬季。1941年冬又沿滇缅铁路线到了孟定、耿马一带。1945至1946年，在车里住了整八个月，对车里、佛海、南峇、六顺境内的摆夷，看了一个大概，这几次的考察资料，便是我写作本书及其他关于摆夷论著的依据。

掸人在亚洲是一个大族系，就西南边区说，则他是三大族系之一，而摆夷是掸人中的主干。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于此族的研究已经有极高的成绩，言专门著作，则 William Cléfton Dodd 的 *The Tai Race*. George Scott 的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 Terrien de Lacouperie 的 *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 W. A. R. Wood 的 *A History of Siam*; W. W. Cochrane 的 *The Shans*; 和 H. R. Davies 的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等，都在学术界上有灿烂的成就。暹罗人对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例如陈礼颂辑的《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一书中，便有几篇关于掸族的著述。日本学术出版物中，

也时有此类文章可看到。回顾我国对这方面的探讨，却就寂寞冷淡得可怜，从历史典籍中翻寻，较早如《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唐樊绰的《蛮书》，刘恂的《岭表录异》，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元李京的《云南志略》；稍后则明清人的著述，如李元阳的《云南通志》，杨升庵的《滇记》、《滇载记》、《南诏野史》，张泳的《云南风土记》，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冯苏的《滇考》，师范的《滇系》，以至各府州县志书中，虽也有关于掸人或摆夷的记载，但尽都是零星的记录，说不上有系统的研究。其中比较可供引据的还应当算明人李思聪的一部《百夷传》，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麓川土官思伦法以兵侵缅甸，缅甸遣使诉以朝，上遣行人李思聪、钱古训持诏往谕，李等自昆明经永昌过怒江走入今腾龙沿边的摆夷区，归而著百夷传，算是实地经历的材料，与道听途说者自不同。

近人关于摆夷的著述也只是可数的几种，成为专书的，较早的有李拂一的《车里》（1933年商务版），近年则有徐松石的《傣族壮族粤族考》（1946年中华书局出版），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1948年大东版），车里宣慰使署中 useful 摆夷文写的一本《历代宣慰简史》，李拂一译为汉文，题名《溯史》，已由云南大学出版。三年前我曾写过两个摆夷区域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和腾龙边区开发方案，均已印为专书出版。抗战期中，若干大学及学术机关迁滇，许多学者都有机会入摆夷区域实地调查，由此而产生了多篇关于摆夷的学术论著。例如董彦堂的《奘夷历法考源》（《西南边疆》第三期），陶云逵的《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边政公论》第九期），李景汉的《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西南边疆》十一期），张印堂的《云南摆夷特征及其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学报》一卷二期）等；算是多少点缀了这荒芜的研究园地。

我觉得研究西南民族，摆夷是一个最值得研究与最容易研究的对象，不论在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上，都具有特殊的形态而保有原始的遗留，就是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任何一个项目被采取后，都可作专题来研讨。他们都集居在一个区域里，对调查的人言，可以说材料是集中的，只要走入摆夷区中，便可以得心应手的拾取资料。他们的文化已相当进步，对于被提出询问的问题，很容易得到完满的答复。尤其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字，而这种

文字且是相当普及，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可由他们的文字记载中寻得，这一点，便远非其他西南民族所及。所以我说，摆夷是最值得研究与最容易研究的对象。可惜自己辜负了这大好的机会，十二年内数度出入摆夷区，但却不能够有多大的贡献。这一本小册子的写出，正显示了摆夷区域中可研究的资料之丰富，希望能因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一部分同道们研究摆夷的兴趣。

1949年1月26日江应樑自序于昆明国立云南大学社会研究室。

目 录

序	1
---------	---

上篇：摆夷的经济生活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决定摆夷农业经济的因素	15
第三章 土地公有及其分配	28
第四章 生产技术与农产品	37
第五章 互助的生产与合作的消费	46
第六章 最大的经济消费——宗教支出	57
第七章 政治上的经济负担	66
第八章 结论	74

下篇：摆夷的文化生活

第九章 云南边民与摆夷	81
第十章 人口分布及地理环境	109
第十一章 摆夷的政治组织——土司制度	128
第十二章 经济生产与消费	155
第十三章 生活习俗	174
第十四章 家庭与家族	201
第十五章 宗教与巫术	213
第十六章 语言及文字	234
第十七章 教育	244
第十八章 结论	253

Contents

Preface

Part I Economic Life of the Pai – I (Dai)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Factors Determin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the Pai – I (Dai)

Chapter 3 Community – Owned Land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pter 4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apter 5 Mutualism in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onism in Consumption

Chapter 6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Religious Expenditures

Chapter 7 Financial Burden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

Chapter 8 Conclusion

Part II Cultural Life of the Pai – I (Dai)

Chapter 9 The Cross – Boarder People and the Pai – I (Dai)

Chapter 10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apter 11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Chapter 12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hapter 13 Living Customs

Chapter 14 Family and Kindred

Chapter 15 Religion and Magic

Chapter 16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Chapter 17 Education

Chapter 18 Conclusion

上篇：摆夷的经济生活

第一章 导论

一、释名

摆夷及人类学家所称的台族 (Tai or Htai) 或掸族 (Shan), 是西南边区中与藏缅语系 (Tibeto - Burman) 及蒙克语系 (Mon - khmer) 鼎足而三的一大族系, 其人自称之为“歹” (Dai), 汉人通称之为摆夷, 不知何所本。或谓“摆夷”实应作“僂夷”, 清人檀萃说: “僂夷, 一名摆夷, 又名百夷, 盖声相近而讹也, 性耐热, 居卑湿棘下, 故从棘从人。” (见《滇海虞衡志·志蛮篇》), 依此解释, 则今之摆夷, 应当便是礼记王制所称“屏之远方, 西曰僂”的僂; 也便是吕氏春秋恃君览所称“僂为西方无君之人”的僂;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称“笮马僂壮髦牛”的僂; 《华阳国志》所称“僂道县本有僂人”的僂。不过, 从民族发展的迁徙史迹上看, 秦汉时四川境内的“僂”迁到云南而称为“摆夷”, 这种史事迹象尚不能找到明确的证据。又有人说: 古之所谓“僂”是属于羌民族系, 今之所谓“摆夷”, 是属于掸族系, 是各不相干的两个民族, 僂人的后裔是今日云南大理一带的民家 (或作明家), 这种说法, 也还要待民族史资料的证明。大概以“摆夷”作“僂夷”, 始自明李元阳所修的《云南通志》, 之后, 各家著述及地方文献, 对于“摆夷”、“僂夷”便都随意书写而无所分别。友人方国瑜教授谓摆夷二字当是“白衣”之别写, “白衣”一名在唐人著作中已见之, 《宋会要》及《经世大典》亦屡见, 元明则作百夷, 或白夷, 清代始写作摆夷, 因为此族人男女所穿之上衣, 通常都为白色, 故称之为白衣, 后乃别写为百夷、僂夷、摆夷。这是一个很新颖而近情理的解释。

在云南境内, 对于摆夷一般又有水、旱、花腰的分别, 《云南通志》, 伯